



张謇广 主编

罗高寿 与 中国

LUOGAOSHOU YU
ZHONGGUO

罗高寿

张德广 主编

中国



世界出版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高寿与中国 / 张德广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12-3563-6

I. ①罗… II. ①张… III. ①罗高寿 (1932~2012) —纪念文集
IV. ①K835.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1385 号

书 名	罗高寿与中国 Luo Gaoshou yu Zhongguo
主 编	张德广
责任编辑	柏 英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投稿信箱	xueshuchuban@126.com
网 址	http://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10 ¼ 印张
字 数	110 千
版次印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563-6
定 价	3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1 序言 张德广 / 1
- 2 我们知道的罗高寿 田曾佩 李景贤 / 3
- 3 我与罗高寿 熊光楷 / 17
- 4 中俄党际交往的积极推动者
——忆罗高寿先生 陈凤翔 / 21
- 5 忠诚的爱国情 浓厚的友谊情
——追忆外交家罗高寿 万成才 / 27
- 6 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我所知道的罗高寿大使 朴扬帆 / 39
- 7 我与罗高寿大使的交往 潘大渭 / 47
- 8 人民外交家
——忆罗高寿大使 李英男 / 57
- 9 一生一世中国缘 李景贤 / 63
- 10 罗高寿先生二三事
——与《中国》杂志的一段情缘 黄慧珠 / 79
- 11 纪念罗高寿大使 杨 宁 / 89
- 12 怀念罗高寿大使 陈昊苏 / 93
- 13 罗高寿大使让我实现了“生态梦” 蒋明君 / 95
- 14 往事难忘 张德广 / 101

- 15 忠诚于自己事业的典范 [俄] 巴尔斯基 / 109
- 16 “大人物” 罗加乔夫 [俄] 巴尔托夫 / 125
- 17 杰出的外交家 优秀的人才 [俄] 冈察洛夫 / 131
- 18 罗加乔夫：新闻记者的朋友 [俄] 基里洛夫 / 143
- 19 罗高寿：政治家和普通人 [俄] 扎哈罗夫 / 149

序 言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张德广

我与罗高寿交往近三十年，这期间我们因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经常有机会见面和交谈，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

“罗高寿”是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先生的中文名。他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13年，这在外交史上是不多见的。这期间，罗高寿参与了中俄关系的几次大发展，即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中国，他经历了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时期的改革开放和对外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高寿深谙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工作积极勤勉，为人和蔼可亲。他在中、俄两国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的外交家、汉学家风范及人格魅力，使他在中国赢得了一般外国人难以企及的声望和赞誉。

2012年4月7日罗高寿逝世后，我一直想以某种方式纪念这位为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俄罗斯外交家。2012年6月26日，在我的倡议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举办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中俄双方的罗高寿生前好友、研究中俄关系的专家和学者以及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

等数十人出席。

2013年春，罗高寿的儿子伊里雅来北京出差，他向我提议，由其父罗高寿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朋友们共同撰写一本书，请我出面筹措资金，并在两国出版。他的提议与我一拍即合。经过一番筹备，出书之事很快启动。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未能联系到罗高寿大使的更多朋友为此书撰稿，同时出版中文和俄文两种版本的初衷也未能实现。谨以此书的出版深深缅怀这位杰出的俄罗斯外交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相信本书将会博得中俄两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2014年3月7日

我们知道的罗高寿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田曾佩

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原副司长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原公使 李景贤

罗高寿先生是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外交家，曾任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第一远东司司长、副外长，俄罗斯驻华大使等要职。因为他中文好，上个世纪50年代曾担任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翻译，之后又多次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所以，罗高寿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得比较早，而与他的直接接触则是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举行以后了。在罗高寿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计划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我们两人回顾了过去的一些经历，深深地怀念这位曾经和我们共事过多年的老朋友。由李景贤核对了相关资料并执笔起草了这篇文稿。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罗高寿

从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42年零86天的风风雨雨：从开始十年的全方位友好，到十年的意识形态对立，再到十年军事对峙。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苏方深感苏中关系恶化的严重后果，中方也准备着手处理中苏关系问题。经过几次逐步升级的外交回合，1982年9月，双方商

定由副外长级的两国政府特使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从第一轮（1982年）到第七轮（1985年）磋商，中方特使是钱其琛，苏方特使是伊利切夫。在磋商中，中方着重希望苏方做些实事，以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苏方则避实就虚，说磋商的任务是制订两国关系准则文件。双方在磋商中展开辩论，唇枪舌剑，你批我驳，气氛相当“热烈”。

令人意外的是，第一轮政治磋商结束后才20天，即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安德罗波夫接任一年三个月后去世了。再继任的契尔年科在位时间就更短，一年一个月后离世。从勃列日涅夫去世到契尔年科去世，总共才两年四个月。有人称这一时期为“苏联最高权力过渡期”，也有人说是“真空期”。在此期间，苏联“连丧三帅”，同时又是“病夫治国”，中苏政治磋商不大可能取得进展。

1985年3月10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苏联解体后，据俄方人士说，戈尔巴乔夫深知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在更换外长的同时在两个对华工作关键岗位上也做了选择性“布子”。一方面，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知华派”罗高寿任命为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外长，兼任苏中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苏联政府特使；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要选派一位外交经验丰富、能客观分析形势并敢于向上反映实际情况、同苏中关系昔日恶化又无瓜葛的外交官任驻华大使。据此，苏联原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中选。他们两人是在苏中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的转折过程中被委以重任的。

1986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第八轮政治磋商时，罗高寿首

次出马。苏方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但罗高寿在谈判方式、用词和说话口气等方面与前任明显不同。伊利切夫是位哲学家，谈起来理论色彩强，喜欢论战；罗高寿则比较务实和谨慎。

1987年和1988年，中苏两国在贸易和人员来往方面有所增加。苏方开始考虑如何降低在苏中边境地区的驻军水平，从蒙古、阿富汗撤军等重大问题，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也在与越方商讨。在这两年举行的第九至第十一轮磋商中，苏方的立场逐渐有所松动。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方面，罗高寿开始表现出灵活性，不再像其前任那样说中方提出与苏方谈柬埔寨问题是“找错对象”。1987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轮磋商中，罗高寿承认上述问题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中的一大重要因素，说苏方在这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将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1988年4月，钱其琛出任外长，田曾佩6月13日至20日同罗高寿在莫斯科举行第十二轮政治磋商。田曾佩与其前任一样，始终抓住要苏方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不放。在这次谈判中，罗高寿对我方提出的观点一一加以解释，用词比较谨慎，语气比较平和。他曾说，苏联虽不是当事国，但柬埔寨问题的解决确实取决于苏联和中国两家，在会后私下交谈时他表示他本人将尽力在这方面起“建设性”作用。

在磋商结束前罗高寿提出，他愿意作为苏联副外长与田曾佩副外长就柬埔寨问题专门举行一次会晤。1988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两位副外长在北京举行四天务实会谈，之后达成了内部谅解，把一些共同点和相近观点写入一项共同记录。这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准备了

条件。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罗高寿陪同参加。当他被介绍给小平同志时，老人家略为停顿后若有所思地说：“哦，罗高寿同志啊，你给我当过翻译，这个嘛，记得！”又说：“那是50年代的事儿，那时你还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啰！”罗高寿用汉语回答：“是，小平同志，是这样的，我那时才二十七八岁，初出茅庐，小翻译一个！”罗高寿曾说过，他有幸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当翻译，这是他一生莫大的光荣。

此后，田曾佩与罗高寿在多种场合谈过柬埔寨问题。最重要的一次是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罗高寿来华与田曾佩最后敲定中苏联合公报文稿。4月23日至27日，两国副外长举行了七次会议，着重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柬埔寨未来联合政府的组成、就上述两大问题的国际监督等三大问题继续交换意见。根据他们谈妥的意见，两国专家日夜开会，就一些文字表述反复地仔细进行推敲。应该说，罗高寿副外长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寻求共同点。罗高寿对田曾佩说，现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还引用这样一句俄谚：“小鸡能否成活，到了秋天才算数”，意思是说苏中关系正常化指日可待了。

中苏边界谈判中的罗高寿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举行了三次边界谈判。1964年2月至7月，第一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双方着重就中俄界约不平等性质进

行了辩论，划定边界的条件并不具备。

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东、西两段发生了武装冲突。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决定恢复两国边界谈判。10月20日，副外长级的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当时，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两国边境地区局势紧张，双方自然不可能务实地解决极为复杂的中苏边界问题。这只是一场务虚性“马拉松”，双方逆向而行，断断续续地谈了整整十年。1979年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这次中苏边界谈判便告中断。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公开发表讲话，公布缓和苏中关系的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同意中方关于在界河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主张。邓小平同志认为，苏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指示早日与苏方恢复边界谈判，争取把中苏边界划定下来。

1987年2月，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第一轮会谈在莫斯科举行。中方团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团长为罗高寿副外长。双方重申原有立场后，就开始务实地讨论两国边界问题。对此，罗高寿加以确认，表示钱部长所说的三条原则“我们表示赞成，只是个别文字表述还可以推敲推敲”。

当年8月，钱其琛和罗高寿两位团长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钱其琛提出可着手进行划界工作谈判，并建议成立联合专家组进行此项工作，罗高寿表示同意。中方指定副司级参赞李景贤、苏方指定副司长魏列夏金为双方组长。

1988年10月，第三轮边界谈判在莫斯科举行。田曾佩副外长出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苏方团长依然是罗高寿。

在会谈中，田曾佩建议把联合专家组的双方组长此前已商定的大部分东段边界线肯定下来，罗高寿表示同意。之后，中方团长着重谈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双方相持不下。会外私下交谈时，罗高寿说：“苏方开发黑瞎子岛快60年了，应该考虑居民的生产、生活利益。”田曾佩表示，居民的生产、生活利益可以照顾，但首先是黑瞎子岛回归中国。此后，两位团长还举行过三轮谈判。田曾佩依然着重谈黑瞎子岛归属问题，罗高寿还是说些老话，作出简单回应。

当时的中苏边界全长7600多公里，黑瞎子岛的长度只占其1.4%，它的归属成为中苏边界谈判中一个咬不动的“硬核桃”。谈判本是相互妥协的产物，但中苏双方在该岛归属问题上都一直不松口，坚持全部划给本方。这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当时的实际考量。可见，当时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

2000年5月7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三个多月后他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江主席与普京在小范围会谈中建议，责成两国有关部门就黑瞎子岛归属问题抓紧谈判，尽快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全面彻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普京听后说得很干脆：“尚未解决的两国边界问题，应该尽快得到解决。”两国元首表态了，但落实起来也并非易事。在四年多时间里，中、俄外交部领导人及专家进行了艰苦谈判，到了2004年8月2日，双方代表才把黑瞎子岛的边界线划定下来。该岛当时测定的面积为335平方公里，中方划得171平方公里，俄方划得164平方公里。可谓好事多磨，但终有善果。

至此，延续整整四十年的中苏（中俄）边界谈判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世界上最复杂的边界问题的全面、彻底解决，为其他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

罗高寿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在北京、莫斯科以及两国其他地方，田曾佩与罗高寿有过不少机会私下进行交谈，往往谈得比较坦率、深入。除与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和中苏边界谈判有关的问题外，还谈及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苏联方面的“对台关系”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7月中下旬，中苏政府经贸科技合作混委会在莫斯科开会期间，田曾佩在会外对罗高寿说：“苏联某些经贸部门正在与台湾方面拉关系，台方积极谋求在莫斯科开设经贸办事处，这些举动我们不赞成，容易被台湾当局所利用，扩充其所谓的‘弹性外交空间’。”罗高寿表示，苏联外交部也密切注意这些动向，又解释说，苏联缺乏消费品，而台湾地区商品从价格到质量，对苏联都有吸引力。田曾佩告诉他，各式各样消费品中国很多，从价格到质量对苏方都应该有吸引力，又何必舍近求远？同时，香港地区也可以向苏方提供优质消费品。罗高寿建议田曾佩在混委会会上提出此事，以引起苏联政府注意。7月21日，田副外长在会上提出这一问题，苏联第一副总理马斯留科夫明确表示，苏方日后准备与台湾方面进行经贸交往前向中方通报，并征求意见。

1991年1月11日，罗高寿副外长来华与田副外长磋商柬埔寨问题。田曾佩私下告诉罗高寿，不久前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去了台湾地区，引起中方严重关切，向苏方提出了严

正交涉。罗高寿解释说，波波夫去台是他自作主张，并不代表苏联官方立场。还说，苏联国内有些部门派人去台湾地区做生意、参加展览，文艺和体育界人士也纷纷去台湾地区挣钱，他们都不同苏联外交部打招呼；台湾地区资本也想方设法打入苏联市场，这些事情苏联外交部事先都不知情。他摊了摊手，用中文对田副外长说：“给田部长说句老实话，‘苏台关系’好些问题我们外交部控制不了。但今后仍将采取措施，力求不超出中方所设的限度。有些涉台问题如把握不好，就事先与中方磋商。”田曾佩表示赞赏他的这种态度，强调“苏台关系”特别敏感，弄不好容易被台湾当局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应引起双方高度警惕。罗高寿表示，他本人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处理不当就会给苏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为戈尔巴乔夫顺利访华释放正能量

回顾苏中关系那段不幸岁月时，罗高寿对我们说过，其实好多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没有往下细说。苏联解体后，俄方知情人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材料时，这位苏联副外长在内部说过，苏中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两国国家关系，始于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在华工作的专家。事情应从两方面说。一方面，1958年在中国开始的“大跃进”违反经济规律，特别是废除一系列规章制度，给在华的苏联专家工作造成极大困难，不少人说，再这样的话实在没法工作下去了。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在东欧国家多个党代会上与赫鲁晓夫等人对着干，令他相当恼火，遂下令一周内从中国撤回全部专家。苏联高层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急

处理”，赫鲁晓夫便派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去华，与中国领导人磋商。周恩来希望撤专家的速度放缓一些，两三年，最快一年内撤完。阿尔希波夫回国后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汇报。与会者听后心情沉重，在会上无一人发言表态。阿尔希波夫还多次求见赫鲁晓夫，但后者以“情况都已清楚”为由避而不见。罗高寿强调，赫鲁晓夫当时假如理智一些，苏中关系也许还会有转圜的余地。

我们在上面提到，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在对华工作中“设局布子”，一“子”为罗高寿，另一“子”为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他们一位“在内”，一位“在外”，为推动戈尔巴乔夫下决心在苏中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迈出实质性步子、为他成功访华作出了不少努力。苏方知情人讲过这样几个两人“里外配合”的例子。

1988年秋，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一事尚未完全敲定的情况下，罗高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两人商量后向“上面”进言，如果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正面评价邓小平的文章，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8月12日，《真理报》以显著版面刊登题为《邓小平的政治画像》的长文，称赞这位中国领导人“敢于放弃已被实践证明不正确的那些决定”，“以其勇气及现实主义精神开创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1989年春，北京的政治气候开始不平静起来，有些学生上街游行。在苏共高层，一些对华态度不积极的有影响人物主张推迟原定于5月中旬进行的戈尔巴乔夫访华。罗高寿

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两人力陈戈尔巴乔夫如期访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苏方如主动提出推迟此访，中方很可能将其无限期拖下去，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见就会成为泡影，他日后访华的意义将大打折扣。他们两人还强调，中国领导人完全能够控制国内局面，不会出现不测情况。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也认为，推迟访华弊多利少，决定维持原议。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首次踏上中国的大地。

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曾出现过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随访的个别“民主派”主张这位苏联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与当时聚集在那里的学生们见面，给他们“鼓鼓劲儿”。另一个是北京个别高校有人持“学生签名信”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恳求戈尔巴乔夫拨冗到校发表演讲。在内部研究时，罗高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对这两个突来之举都持否定态度，这对戈尔巴乔夫访华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出使中国十三年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议会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俄罗斯联邦与苏联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对苏联原有的权利与义务（包括债务）进行了“切割”。27日，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正式取代苏联的原有席位。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也就改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次年2月10日，他约告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司长朱安康：叶利钦总统任命罗高寿为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征询中方意见。索洛维约夫对陪见的副司长李景贤说：“您与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熟，他的经历您比我更了解。”在欧亚司写的上呈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苏